

莫使春光别去

刘心武



荀慧生指导孙毓敏排练戏

始终记得六十年前那一天，跟着我小哥刘心武去看戏——他是个地道的京剧迷，不但爱到各个剧场看戏，自己也登台唱戏。他攻梅派，曾登台彩演过《女起解》《三堂会审》《二进宫》《大登殿》《二堂舍子》。虽然最迷梅兰芳，但四大名旦中其他三位——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也都喜欢。程砚秋1958年就去世了，小哥对能在程砚秋在世时，赶上程大师最后一次唱《锁麟囊》，津津乐道；梅兰芳最后排出的那出《穆桂英挂帅》，他看过三次。那次他带我去看的，是荀慧生的《荀灌娘》。

那场戏，买到的票，是在当时的崇文区工人俱乐部，离我家很远，去那里要倒换好几趟公共汽车，我哪有那么大的兴趣？倒车时左等右等不见车来，就就算了回家吧，小哥就跟我说了，这样的艺术大师的演出，看一次少一次，错过一次就可能永远错过，他说前些天，他跟戏迷朋友刚看过尚小云的《双阳公主》，好极了！现在再看荀大师的《荀灌娘》，也会是终生难忘的。正说着，车也就到了，我们挤了上去。

果然是终生难忘。那天演《荀灌娘》，荀慧生已是花甲之年，且已发福，戏里的荀灌娘应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但大师终究是大师，出场几分钟，就以他的演技，骗得我这样的观众认可了台上是个古代少女。如今荀慧生已谢世五十一年，小哥刘心武竟也别去了十一年，但小哥引领我进入了观赏京剧的门槛，使得我多年来保持着进剧场看京剧的习惯。

今年春天，看到北京长安大戏院有《战宛城》演出的预告。小哥告诉我，荀慧生艺名白牡丹，另有黄玉麟艺名绿牡丹，还有筱翠花艺名小牡丹又叫小水仙花，这些演员的表演都如花绽放，他说筱翠花擅跳功，就是在脚底下绑上木头削制的古代妇女的三寸金莲，表演小脚妇女的种种动态，别有一番意趣。小哥说我家刚迁北京时，他看过筱翠花最后一次贴演的跳戏《战宛城》，确实功夫不凡，但是后来跳戏演出被取缔了，我当然也就一直没能看上跳戏的旦角戏。没想到如今有青年演员王梦婷出演《战宛城》，机会难得，岂能错过？演出那天，赶往剧场。

没想到，正往剧场里走，只见前面远处一个背影，朝门里迈进，好熟悉！是孙毓敏吗？可是等进到剧场，前厅人来人往，已不见她的踪影。我各处找寻，在二楼贵宾休息室，看到两个人正坐沙发上聊天，其中一位正是孙毓敏。我上前招呼：“你可被我逮住了！”她惊喜莫名：“呀！你呀！多少年没见啦？”

算起来，我们有二十多年没有谋面了。我们是在改革开放的春光里认识的。1979年，我们都住进了北京东南广渠门外的劲松小区，现在看来，那时候我们住进的楼，自然是落伍了，但在那个时段，是一般北京市民还轻易住不进去，被不少人羡慕的。我家住在一栋楼最高层的一个小两居里，孙毓敏家则住在同一栋楼的另一个门内楼层好，也比我家的三居室里。那时候不少文化人、艺术家住在那附近的楼里，我记得戏曲演员除孙毓敏外，还有跟她同在北京剧院的李崇善，石宏图叶红珠伉俪，还有昆山的李淑君，河北梆子剧团的女士李士贵，歌手李明瑛，以及诗人刘湛秋，《光明日报》

的王晨、理由，剧作家邢益勋，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我跟其中多数人都认识或有所交往，而交往密切的，当属孙毓敏了。

不少人读过孙毓敏的自述《含泪的笑》《我这两辈子》，其中若干段落，报刊网络也时常摘录传播，孙毓敏在写那两本书期间，跟我详谈过她的坎坷，起了决定性作用。一个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部长黄镇——这是懂懂文化艺术的老革命，长征途中，他画了不少速写，弥足珍贵。他任文化部部长后，人们比较熟知的事迹，是张艺谋报考电影学院，因年龄超规要被刷掉，张艺谋就把自己的摄影作品寄给他，希望能够圆梦，本也不抱太大希望，没想到黄镇看了那些摄影作品，爱才惜才，很快建议电影学院在年龄上对张艺谋，破格录取。

其实黄镇当时做的这类内行领导内行的例子还很多，其中就有他看到孙毓敏从河南寄给他的信，打动他的，应该不仅是孙的不幸遭遇和以坚韧毅力重返舞台的决心，还有黄镇懂行，懂四大名旦，重视四大名旦形成的四大流派的传承。他毅然拍板，把已经下放到河南的孙毓敏调回北京，到北京京剧院把荀派艺术发扬光大。

今年10月份的《小说选刊》，重新刊发了我1977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班主任》，以及蒋子龙1979年也发表在《人民文学》的《乔厂长上任记》。我的那篇不去说了，我重读蒋子龙的小说，仍然和四十年前初读般动容，我深深地知道，改革开放初期，那一批顶着压力，勇于承担责任、挑起国家复兴重担的干部，是多么可贵，到现在，他们有的已经谢世，有的垂垂老矣，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们那时候在主持平反、讨回公道、挽救能人、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黄镇懂得孙毓敏的价值，当机立断让她回北京继承荀派艺术，这事不应被淹没在逝去的岁月中。

另一个帮助孙毓敏重返舞台大放光彩的人物，就是她的爱人老洪。五十年前，老洪还不老，是河南京剧团的一个电工，在孙毓敏遭诬陷跳楼截瘫后，他到孙毓敏身旁，悉心照顾这个陷于绝望，并且还背负着罪名的弱女子，老洪并不懂戏，更没有什么帮助孙毓敏重返舞台的想法，他就是同情她，爱她，他

不能看着这个女子死去，或者生不如死，他要给她温暖，呵护她，鼓励她一天天恢复生命力，也恢复生的乐趣。他们都是上海人，能用沪语交流。孙毓敏站起来以后，他们结合了。他随孙毓敏一起回京。当时不仅我和孙毓敏来往，我们两家也来往，我跟老洪混得哥儿们。老洪的母亲，孙毓敏的婆婆，慈祥勤劳，善烹饪，有时她家做出好吃的，就约我和爱人去共享；我家做出得意的菜肴，也往她家送过。那天在长安大戏院贵宾休息室，见到孙毓敏不久，我就问老洪情况，她笑说，哎呀，老洪八十五啦，背都驼啦！还站起来，学老洪驼背走路，又说：他也就是这么点问题，其实身子骨还硬着呢！我心大物。

孙毓敏重返舞台以后，不但重排了荀慧生演过的诸多剧目，还亲自动手，编写剧本，设计唱腔身段，移植了一些剧目，有朋友跟我议论：孙毓敏移植改编的《痴梦》，舞台效果非常好，但是他觉得多少有些疑惑：孙毓敏为什么要花大力气编排这么一出戏？按说荀派擅长塑造的是活泼少女或哀怨弃妇，怎么现在给观众看的却是一个嫌弃爱富达到痴狂地步的渣女？我没问过孙毓敏，但我隐隐觉得，作为艺术家，创作时会有心灵密码在起作用，鞭来买臣妻崔氏嫌弃弃夫追富求贵，这一出讽刺喜剧的背面，不也是女性对坚贞不二的婚恋态度的一种巧妙宣示吗？老洪在台，想必看得呵呵过瘾。

孙毓敏责怪我，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不跟她联系？我说，这些年好风凭借力，送你上青云，你是那么荣耀，我只能仰望，哪敢去打搅？这二十年来，她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获得许多的奖项与荣誉，1991年起担任北京戏曲艺术学校校长（现已升格为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人们称她孙院长），她带出的学生，仅荀派，就有唐天香、常秋月、熊明霞等艺术上臻于成熟、初具大家气派的传人，俨然已是目前荀派的泰斗级人物。我这么说，她连摆手，嗔怪我不该跟老朋友见面。

没过多久，孙毓敏主动来我住处叙旧。她赠我一轴装裱好的大字“福寿”书法，题目“尊敬的好友心武及家人正之”，可叹的是当年跟她很熟的我的妻子、岳母，以及跟她就荀派艺术有深入交谈的小哥，全都去世了，我们都感慨不已。

我们一起聊戏。那天王梦婷出演《战宛城》，真是豪华阵容：请来上海京剧院的奚中路饰典韦，天津京剧院的陈晓亮饰胡车，曹操、张绣则分别由北京京剧院韩巨明、李宏图饰演。这出戏里王梦婷的戏份并不多，在戏里她饰演宛城守将张绣的寡媳邹氏，竟与征服者曹操来了一段闪恋。戏里最重要的一场是邹氏思春，踩跷出场，以种种跳功，揭示她内心的苦闷。

孙毓敏作为这出戏的艺术总监，她告诉我，王梦婷虽是她的学生，但这出戏严格来说不是荀派戏，是筱翠花的

戏，王梦婷是从筱派的陈永龄那里学来的，是在舞台上恢复跳功的一次尝试，邹氏思春，过去多有情挑逗，这次排演，则着重表现封建礼教禁锢正当欲望的反人道一面。

我们又谈及荀派特色——一般都这样概括：梅派典雅，程派沉郁，尚派张扬，荀派俏丽，对此我们都觉得未免皮相。孙毓敏说，其实荀派完全可以表现小姑娘活泼俏丽的固定路数里跳脱出去，开辟出更广阔的天地。我就说，比如你改编的《痴梦》，她就说，《痴梦》是一种跳脱，其实她还改编了《姊妹易嫁》《陈三两》等等，特别是《一代贤后》，应该是让荀派更具表现力了。我说，当年我小哥刘心武跟你交谈，说他特别佩服荀慧生那“上台三分生”的艺术追求，孙毓敏就说，你们那年看的《荀灌娘》，应该就是荀先生最后的演出，那以后他这出戏就都让我演了，是呀，演来演去，熟了，上台似乎不用动脑筋，一环环往下流动就得了，可那样就成了油子了，所以我牢记先生的教诲：上台三分生，我是在塑造人物呀，这个人现在如此，往下会怎么样？不能油滑地往下溜，要把那个人物的心理活动通过外部形态和唱腔表达出来，每演一回，就是跟那个角色生活一回。

孙毓敏的演出如今积累了很多视频资料，但她没拍成电影。198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根据我中篇小说《如意》改编的同名电影，那期间我跟北影厂的一些人士有较密切接触，就鼓励他们把孙毓敏主演的《金玉奴》拍成舞台艺术片。那时孙毓敏刚过四十岁，艺术上趋于炉火纯青，而同台的那些演员，也都个个塑造出可信的艺术形象，整出戏属于“一棵菜”的最佳状态。我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但孙毓敏一直为此感谢我的好意，又感叹，当年四大名旦梅、程、尚都拍了舞台艺术片，唯独荀先生未能拍摄。她透露，原来是准备给荀先生也拍一部的，但是师母觉得不用着急，再等等罢，荀先生就去上海拉双眼皮去了，谁知回来不久就形势大变，留下最大遗憾。

孙毓敏说我变化不大，我赞她保养得好，她呵呵一笑，指指头发，说声“假的”，然后把头发摘掉，笑得更加。重新戴好假发，她跟我说：“老了，在台上演不了了，可是，还要发挥余热，跟你透露吧，我正筹备一个叫做《荀风毓骨》的大型展演，明年，我的学生们将纷纷登台，给观众们奉上荀派艺术的满汉全席！到时候你还要来捧场啊！”那还用说！

其实，孙毓敏是个挺有争议的演员。改革开放初期，京剧演员常组团到各地演出，多是演折子戏，有的演员就不愿意跟孙毓敏同行，因为孙毓敏不管戏码排在第几出，她一上场，总是喝彩声最多。

我亲耳听到这样的批评：表演过度用力，一个高音挑上去，台下不叫好，她绝不把音落下。孙毓敏还在有的戏里当场挥毫写书法，她在有的场合用英语唱《苏三起解》，一个人用梅、程、尚、荀四种腔调唱同一唱段。

我问过孙毓敏，为何如此？她坦言，京剧固然要塑造人物，演顺故事，但京剧具有鲜明的娱乐性，必须让观众看着带劲听着过瘾，她觉得讨好观众，向观众索取掌声与叫好声，是必须的，对此她不想改变。

三十几年前，孙毓敏的演出我几乎每戏必看，有时还会到后台看她化妆，有时演完她谢幕，我也上台给她献花。记得有一次演完她谢幕，坐第一排的人没有上台的，只有我上去了，她后来悻悻地跟我说：“那些人拿着赠票看戏不上台慰劳演员，说什么，哎呀，我们是普通观众！你普通观众你不自己花钱买票！你那头排票怎么来的？我们唱戏的，就得有人捧！谢幕时就该热热闹闹！”不过那时候她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也许她现在想法有所改变？

有人提醒我，戏曲界也蛮复杂的。我写这篇文章绝无贬低冒犯其他在世的荀派大咖的用意，只不过我跟他们没有交往，而我和孙毓敏，确实是沐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起走过来的，我记叙的是春天的故事，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

2019年10月20日 绿叶居中

在近代来华的英国人当中，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无疑置身于知名度最高的第一方阵。他是宣统皇帝溥仪的师傅——尽管溥仪跟他学英文的时候（1919—1925年）距位已久，但他的确是末代皇帝。洋人而为“帝师”，上下五千年，史无前例。

二十年代中叶，溥仪和他的一套皇家班子被赶出了皇宫，“帝师”庄士敦也只好就此下课。五年后他结束在中国的工作返回英国，重拾教鞭，当上了一名汉学教授。此后，庄士敦老师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他后来的经历其实还是比较好玩可以一谈的。

1931年3月底，庄士敦被正式任命为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学教授，这个位置可以说来得比较轻松。虽然招聘消息一经公布，先后有九人提交申请，但进入3月初最后面试的只有庄士敦和叶女士（Evangeline Edwards）两人。面试重点考察口语水平，庄优势明显。当初请他当帝师，正是看中这一点。溥仪的评价应该可以一锤定音：“他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比陈（宝琛）师傅的福建话还（益藩）师傅的江西话还易懂。”（《我的前半生》）庄士敦1898年就来到中国，曾长期在英国租借地威海卫任职，直到1930年租借期满。前后三十多年的摸爬滚打，他早已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通。叶女士虽然也在中国当过传教士（1913—1919年），和庄比起来，毕竟资历尚浅。再说教授遴选委员会中还有庄的熟人，其中骆克哈特（James S. Lockhart）一言九鼎，乃是庄在威海卫的老上级，也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

当上教授后，庄士敦发现情况远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妙，甚至可以说相当糟糕——每周上课14小时，大部分都是基础的汉语训练。这当然是东方学院的性质决定的，自1917年建院以来，它的培养对象一直都是那些准备去英国殖民地的官员和商人。语言训练离不开重复，一段时间还可以，天天如此、年年如此，确实让人难免厌烦。课程乏味，人际关系也不佳。中文系是小系，庄士敦是教授兼系主任，手下两大员将。一位是叶女士，她从中国回来后于1921年开始在东方学院任教，工作十年想竞聘本系教授职位，结果被庄士敦这个外来户抢走了，她的心情可想而知。另一位是卜道成（Joseph Bruce），曾在海外传过教，是原先的教授，庄士敦就是接了他的位置。卜不当教授，但继续在系里上课，按时付学费，待遇类似特聘教师。前后这样的落差，估计换了别人也很难愉快地接受。面对这两个心怀不满的下属，庄士敦的策略是躲，上完课立刻回家，但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吗？1934年卜道成去世后，庄士敦要求招聘新老师，但校方以经费紧张为由拒绝，让庄士敦和叶女士分摊卜留下的工作。有一次上课实在厌烦了，庄士敦就自作主张地缩短了时间，被学生告状后他辩白说：“已经把这门课讲烂了，再重复下去，自己也会烂掉”（more than exhausted the subject, besides exhausting myself in trying to avoid repetition）。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庄士敦最终拿出自己的工资雇人上课，避免了“烂掉”的危险。

1930年10月威海卫归还中国后，庄士敦决定返回英国，毕竟年过半百，也该落叶归根了。他的目标是找一份轻松而体面的工作，考虑过牛津大学的汉学教席，但每年80英镑的收入实在毫无吸引力，东方学院开出的价码可是1000英镑！但光拿钱，不干事，天下哪有这样的便宜？其实庄士敦不是没有讲课能力，他回英国后不断有人请他演讲，不管是关于中国的哪个方面，他都讲得头头是道、引人入胜。1933年他在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系列讲座也很精彩，第二年结集为《儒学与现代中国》（Confucianism and Modern China）出版。就一个题目讲一次，庄士敦是胜任的也是愉快的，他难以承受的是一门课重复若干次，而且一周十几个小时，也让他几乎无暇顾及自己的事情。他最想做的是把紫禁城的那段辉煌经历写出来，1925年就定下计划，但威海卫事务繁忙，没有时间，本以为在东方学

院能空闲一点，事实并非如此。无奈之下，他只好放弃休息和假期，紧赶慢赶，直到1934年初才呈现给读者。《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一经问世就广受欢迎，几个月内连续印刷四次，不仅畅销英国和欧洲大陆，在美国也热卖，并且很快被翻译成了日文。拿到丰厚的版税，庄士敦立刻在自己的老家苏格兰买下了一座小海岛，在那里他可以远离尘嚣，暂时把伦敦和东方学院放在脑后。

东方学院本来对庄士敦抱有很高的期望，他在中国政界、商界、学界人脉那么广，怎么着也能给学院带来点资源。但庄士敦完全不领会这一意图，后来甚至连系主任会议也经常无故缺席。至于教学态度和同事关系，更是乏善可陈。1934年，就在他为《紫禁城》一书春风得意的时候，学院开始酝酿请他退休走人（当年10月庄士敦60岁）的计划，但最终经过斗争还是将时间延长到1937年9月底。学院做出让步主要考虑到庄士敦的国际影响，他当过帝师，这事原先知道的人当然不少，但基本局限在和中国商人打交道的圈子里。现在随着《紫禁城》的热销，庄已经算得上一个文化名人，学院对他必须谨慎。好在庄士敦自己也不太想干了，唯一不舍的是那1000英镑。用版税买上海岛没有经济压力，但维持也需要一大笔钱啊。

庄士敦在教书厌烦透顶的时候，多次萌发过辞职的念头。但自己辞职是一回事，被别人赶走是另一回事。为了报复校方对自己的算计，在延长聘用协议达成后不久，庄士敦就提出请假去中国看望溥仪，声称自从回英国后就一直非常想念这个以前的学生。1935年8月庄士敦经过日本到达长春，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盘桓四个月后，他婉言谢绝了留下来担任溥仪顾问的邀请。

从长春回来之后，庄士敦的教学工作每况愈下，更加心不在焉。作为教授，他是彻底失败了，这让我们更加欣赏他作为帝师的功绩：“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学问的人。”溥仪在他的影响下，毫不犹豫地剪掉了自己的辮子，“谁也没有商量”（《我的前半生》），甚至动了去英国留学的念头。如果这个念想成真，他的后半生将会被大大改写。

当初东方学院选人，太看重口语而忽视学术。其实就学术而言，叶女士是更合适的教授人选。她在去中国前的学历是本科，回国执掌东方学院后不断提升自己，1925年获硕士学位，就在申请教授的1931年，她又凭借研究唐代小说的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完成了从中国通（传教士、外交官）向专业汉学家的过渡。就西方汉学的发展来说，专业化、学术化是大势所趋，叶女士代表了方向。1937年庄士敦退休后，她接替了系主任的位置，并于1939年成为教授，从此东方学院中文系走上了科研和教学并重的正轨。

庄士敦的教授生涯

顾钧

回音壁

熊波特是哪国人

任晓

10月11日“笔会”所载“熊波特氏”一文，有“德奥籍的熊波特氏”一语，似乎不确。

经查，熊波特1883年出生于奥地利帝国摩拉维亚省，年幼时就读于维也纳一所中学，1901—1906年就读于维也纳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解体，欧洲多国“分化改组”。1919年2月，任推举，熊波特被任命为奥地利共和国由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的财政部长，负责处理了战后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接踵而来的价格暴跌。1921年出任维也纳私营皮达曼银行总经理。1925—1932年，熊波特先后在日本任客座教授和在德国波恩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32年因受聘哈佛大学，熊波特迁居美国，一直到1950年1月逝世。可见，熊波特生命中的最后18年是在美国度过的，在学术上有杰出贡献。据已故的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翰·肯尼

思·加尔布雷思在其回忆录《我们时代的生活》中的回忆，熊波特中等偏矮的个子，身体结实，皮肤微黑。他的脸生动而富有表情，喜欢交友，善于交谈。

从以上这些事实看，称熊波特为“美籍奥地利人”是恰当的。那么，他与德国有没有关系？并非没有，主要是他有数年时间任波恩大学任经济学教授，但这段经历并无关“籍”的问题，无论这“籍”是作“国籍”解，还是作“祖籍”解，均是如此。因此之故，把约瑟夫·熊波特称为“德奥籍的熊波特氏”就不够准确了。

巧的是，“熊波特氏”文末提及的“英哲波普尔”也是在奥地利出生和长大的，三十五岁后才先移居新西兰，然后于1945年迁居英国，入英国籍，为著名哲学家，著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猜想与反驳》以及思想自传《无穷的探索》等书，1994年逝世。

笔会

新牡丹系列 (国画) 范新国

